



部的準備事宜，則由屈萬里先生負責。

第一批古物圖書與押運人員於 1948 年 12 月 20 日乘海軍中鼎號出發，領隊為李濟教授。各單位押運人員，故宮為莊尚嚴先生、中央博物院為譚旦岡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勞幹先生。中央圖書館原指定昌彼得與我，但臨上船時，只准一人先去，結果派了我。另外，還有外交部的檔案，押運員為余先生，我已忘其名。中鼎號到上海時，曾稍停留，至 26 日抵達基隆。航行期間，船身擺動甚烈，我不習慣坐船，嘔吐不停，幾乎全程臥著不能起來，也不能吃飯。莊尚嚴先生曾於 1936 年押運古物至倫敦展覽，他說，船經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時，風浪險惡，大部分旅客暈船，但他安全無事，使我們十分欽佩。我們到基隆時，恰是年尾，經過幾天，始將諸事安排妥當，將古物圖書自船中起出，以火車運至桃園楊梅，在那裡小住後，再運至臺中糖廠倉庫存放。

第二批古物圖書由招商局派海滬輪載運，於 1949 年 1 月 9 日運抵基隆。中央圖書館押運員有昌彼得、蘇瑩輝、任蒨三位。運送第三批古物圖書為海軍崑崙船，它於 1949 年 1 月 29 日離開南京，因中途停靠許多港口，至 2 月 22 日始到基隆。中央圖書館押運人員為顧華與儲連甲兩位先生。附船而來尚有員工十多人，內包括屈萬里、舒紀維、藍乾章等諸先生。因人數眾多，家眷另購船票，搭商船來臺。這二批古物圖書亦全部運至臺中糖廠倉庫。自屈萬里先生抵臺後，中央圖書館內部諸事，即由他處理。1948 年 8 月起，改由顧華先生負責。押運人員到臺中後，均先在一家旅館安置。後來得到臺中糖廠同意，在其靠振興路一邊空地建造宿舍 21 間。中央圖書館配到六間，分由顧華、昌彼得、蘇瑩輝、任蒨、儲連甲及我遷入居住。

蔣復璁館長於第一第二批圖書運抵臺灣後，自上海乘中興輪，於 1949 年 1 月 24 日至基隆。昌彼得兄與我相偕到基隆，將他接往臺北南昌街臺灣文化協進會居住。他於 28 日去臺中，然後轉往臺南、屏東等地，於 2 月 23 日飛廣州。在臺期間，他除視察中圖的圖書與會見押運人員外，並計劃在臺灣開館。他曾商得臺南市政府同意，借用文廟；臺南工學院借用員工宿舍。後來政府決定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中央圖書館被併，他自己前往廣州後，即轉歐洲訪問考察，此事未曾實現。

在南京出發時，圖書館曾發給每一押運員生活費

，說明到臺灣後，可能有一段時間無薪金可領，並囑安心等待政府的安排。此事一直到 1949 年 10 月，在臺中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由杭立武先生以教育部部長兼主任委員，中央圖書館組由顧華任組長後，情形始恢復正常。但在近十個月等待期間，除開箱放涼外，大家無事可做，再加上大陸軍事節節失利，不知未來如何，在心理上均感覺十分徬徨。部分人員為此陸續離去，如屈萬里先生受任臺灣大學副教授兼文書組組長，舒紀維先生接受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目組職務，藍乾章先生參加臺灣大學圖書館工作，任蒨女士前往美國，儲連甲先生受聘為臺東圖書館閱覽組組長。我則應張其昀老師之邀上陽明山幫助他處理資料。1949 年 8 月革命實踐研究院正式成立，被聘為圖書課課長，負責圖書館事宜。我在南京臨危受命，押運宋元明善本圖書至安全地方，曾認為此係男兒為國應盡的義務。俟在臺一切就緒後，漸漸覺得中央圖書館特藏圖書，原由屈萬里、昌彼得、蘇瑩輝三位先生負責，在臺善本書，只要他們中有二人繼續看管就夠了。其他人員與這批書籍並無直接關係，被調前來，盡了押運的責任，沒有需要再留在臺中，有機會離臺中他就，實在是合情合理的事。這樣做，對保管是項圖書不僅毫無影響，且可減輕新成立的聯合管理處的負擔。

我在中央圖書館時期，適逢國家大變。我的工作地點，自西方的重慶，經過南京，搬到東邊的臺灣臺中。旅行幾萬里，見到無數各行各色人物，摩挲過不下十多萬冊的書本。雖然日日在緊張之中，但使我得到鍛鍊，增長見識。我在圖書館這行業裡一共做了 40 年，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Nar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21 年，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 9 年，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圖書館 6 年，而以在中央圖書館的年份最短，但中央圖書館開了我從事圖書館事業的門。有了這四年多的訓練，使我以後在工作上，毫無阻礙，一帆風順。在離開四十多年後，追憶中央圖書館，人與事泰半已遺忘，但對中央圖書館，仍懷有十分親切的感情。

1993 年 1 月 15 日於堪培拉

• 王省吾先生，曾任本館編輯，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東方部主任，現已退休。



〈故 舊 篇〉

鄉嬛秘笈歷劫不磨

中央圖書館善本書集藏經緯談

昌彼得

民國 46 年 10 月，蔣故館長慰堂先生擴建南海路舊館館址的閱覽大廳落成，他親自撰了一付楹聯勝於大廳的兩柱，上聯有云：「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鄉嬛秘笈，歷劫不磨」。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圖)從南京運來臺灣的 12 萬冊善本圖書，在當年海內外圖書館善本收藏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這批運臺的善本書，在 43 年 9 月中圖復館後，經過積極整理編輯善本書目出版，並開放閱覽，在圖書異常缺乏的當時，這批善本的公開，對於促進臺灣文史學術研究的風氣，以及出版事業的蓬勃興盛，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其貢獻是不可泯沒的。

中央圖書館不像北平圖書館承襲京師圖書館，有明清內閣大庫的舊藏奠基，籌辦時可以說毫無基礎。然而不過十五年，竟有如此豐碩的收藏，假若不是因緣際會，是不可能臻此的。中圖籌備之初，僅由教育部撥發遜清學部舊藏的圖書四萬冊，其中有一部明初內府版「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此書也是內閣大庫之物，不知如何雜在學部藏書之中，中圖即以此書作為善本集藏的始基。繼奉令接收南京國學書局，除了清末金陵局刻書版外，有一部顧炎武的「肇域志」，是金陵書局付梓所清鈔的底本。隨後又陸續購到明嘉靖刻本「龍江船廠志」、太平天國官刊「英傑歸真」、清沈炳震「續唐詩話」稿本。在南京籌備時期，經費短絀，所能收藏的善本，僅此數部而已。

抗戰軍興，中圖隨政府疏散重慶，又購得吳縣許氏售出的善本數十種，收藏漸增。29 年 9 月結束籌備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編制有特藏組專司善本書的典藏考編工作。這時，東南半壁俱已淪陷在日軍鐵蹄蹂躪之下。江南自來是我國人文的淵藪，民間收藏極富，那些文獻故家，因為生活艱困，迫不得已，紛紛拿出家藏出售，善本書流落市肆者甚多，美日等國的圖書館聞訊，多在設法籌款，冀圖收購。滬上有識之士，深懼這些民族文化財富，像歸安陸氏

碩宋樓藏書一樣，淪落異域，永劫難復，乃函電交加，向重慶中央政府進言，建議及時搶購。慰堂館長乃御命於 29 年 12 月潛赴香港，再轉上海，與葉恭綽、張壽鏞、何炳松等港滬文教人士密商蒐購的事宜。中圖在南京籌備時期，曾獲中英庚款董事會同意補助館廈建築經費 150 萬元，因覓取建地延誤，尚未及動工，而蘆溝橋事變發生。除了在 25 年用了 8 萬元，購買中央研究院在成賢街的舊房舍充作辦公處所，及在重慶花了 17 萬元建造了一座分館外，尚餘百餘萬元。復員建館既遙遙無期，而法幣有貶值的趨勢，因呈准以中英庚款會補助建築經費移作蒐購善本書之用。慰堂先生俟一切計議妥當後，於翌年一月下旬，離滬轉港返渝。他潛往上海，是冒著生命危險的，為了逃避日軍耳目，係用化名，但終被日軍特務偵知，緹騎追索，他已於先一日離滬。驚險的經過，慰堂先生曾撰寫「一剎那的決定」一文追憶，刊載於傳記文學三卷一期。

蒐購的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藏書之家深明大義，非常的合作，亦深知戰亂之時，難以世守，大都傾其所藏，售歸公家。不到一年，除普通舊籍外，所獲宋元明槧及稿鈔珍本，不下四、五萬冊，江南著名的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及其子張氏進圃、劉氏嘉業堂，金陵鄧氏羣碧樓，以及番禺沈氏的所藏，悉為中圖所有。其他如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等著名藏家零星散出的宋元精本，也購獲了不少。蒐購的工作，歷時兩年有餘，至 32 年始告結束，一共用了二百多萬元，除由中英庚款會補助建館經費支付外，不足之數，由政府增撥專款滙付。

30 年所購得之善本，均一一加蓋「中樞玄覽」印記，係取陸機文賦：「佇中樞以玄覽」，隱寓中央之意，倩上海金石名家王福庵篆刻，以資識別，陸續寄往香港，暫存放香港大學，擬空運重慶，曾包機空運了一次，但費用太過高昂，未再繼續。其餘的善本



改裝了百多個木箱，箱內附加白鐵皮套箱再予鐸封以防水，計劃船運美國，請我駐美大使胡適洽商寄存國會圖書館，箱上已刷好胡適收件字樣，尚未及運出，而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半個多月後，日本攻佔香港，這百餘箱善本書遂被日本掠奪而去。

抗戰期中，善本圖書流出之際，除了中央圖書館暗中大肆蒐購以外，就我所知，同時亦亟力蒐購的，在上海有會稽沈氏研易樓，在南京有閩縣陳氏閣樓。沈氏名仲濤，在上海經商，為美國印刷油墨中國的總代理，他的先祖沈復榮是清代中葉浙江著名的藏書家，藏書之所名「鳴野山房」。仲濤先生蒐書以精為主，故所藏雖只數千冊，但多為宋元刊及精鈔稿本。共軍南侵，將所藏分兩批船運臺灣，可惜其中一批係交太平輪載運，38年沉沒於臺灣海峽，運臺的宋元版等百餘種一千餘冊在他晚年悉數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陳氏名羣，字人鶴，是汪精衛的得力幹部，抗戰初期，從汪氏到南京組織偽政府，歷任內政部長、江蘇省主席、考試院長等偽職。南京淪陷後，舊書充斥市肆，乏人購買，陳氏開始蒐購，因為他出手大方，視一般稍高，舊書店每有新得，首先送他寓目，陳氏只要是善本，不論同一版本收藏的有無，均予收購，不厭重出，所以同一版本的書往往藏有數部，此有異於其他的藏書家，從這點看，他似乎隱有調濟文獻故家之意，故所得量甚豐，他自稱藏書百萬冊，雖未必此數，但六七十萬冊總是有的。他在上海、蘇州、南京各有藏書處所，而以南京為重心，收藏最多，善本書主要藏在此地。南京的藏書樓名「澤存書庫」，在山西路、頤和路交叉口，佔地估計近千坪，是一座三層

樓，圍建地四周而造，中間是一個大中庭，可供運書卡車迴旋。有二十多間書庫，藏中國舊籍，估計在四十萬冊以上，但多屬明槧，宋元版並不多，仍不乏精鈔稿本。他也喜歡刻書，除刻汪精衛雙照樓的詩詞外，並將所藏清文廷式的手稿「純常子枝語」四十冊及明董其昌「容臺集」予以雕印流傳。在書庫的後方，又建造一座相當精緻的三層樓房，內附和室，供他日本姨太太住居，陳設及收藏若干字畫古董，他也經常住此，有月洞門與書庫相通。他曾請了一位名李佩秋的老先生將他所集得的善本書與普通舊籍各編了一部書目出版，這兩部書目僅只是所藏的一部分。34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陳羣自知末日將至，不待中央軍來接收，即預作安排。一天，召澤存書庫負責人丁寧女士至內室，殷殷以後事相託，囑伊務必妥善維護書庫的收藏，以待重慶中央政府來接收。丁寧女士唯諾後辭出，反身掩門時，見陳羣臉色突變，蓋已服毒自盡，逃避了國法的制裁。陳羣雖是一名漢奸，但他維護文化的用心，仍不能不令人敬佩。

丁寧寧懷楓，揚州人，師事國學大師陳含光，工詞學。她一生的經歷雖非常坎坷，但為人慷慨正直，余與內人之結縈，她從中撮合之力居多。自陳羣仰藥自盡，至中央接收南京尚有近月的時間。當時澤存書庫有工作人員五人，因老板已死，沒有薪水，她需要拿出蓄積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她將大鐵門緊閉，禁止任何人攜帶物品出外，其中有一馬姓職員欲盜賣之不得，至以言詞恫嚇，她不為所動，暗中防範而已。直到九月中央軍進城查封，她才舒了一口大氣，以生命來維護圖書的完整，盡到了忠於所託的使命，照說是中央圖書館的功臣，應該予以尊敬才是。接收後雖然留用，只予以一名起碼的職員名義，而且視為曾作漢奸，有鄙夷的意味，當然，另一馬姓職員從中挑撥也不無關係，所以一年多後，她轉往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工作。

29年9月中圖正式成立時，特藏組因所典藏的善本書不多，工作同仁僅三兩位，由館長兼任主任，屈翼鵬先生曾在特藏組工作了一年多，31年辭職轉往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抗戰勝利後，因蒐購的善本書將陸續集中南京，預料未來的工作必將繁重，館長乃特敦聘屈先生返館主持特藏組，負責善本書的整理考編工作。我是34年9月進館工作，在尹石公教授指導下從事史籍考的編纂，也屬特藏組的業務。35年初，重慶中圖同仁分別搭



作者昌彼得先生(右二)出席本館四十六周年館慶茶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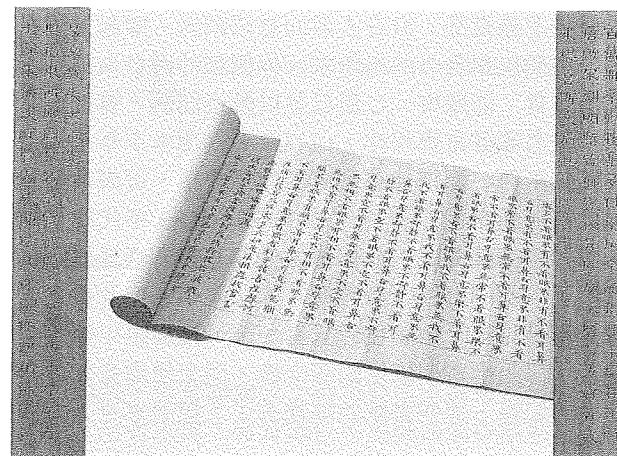


乘船機陸續復員往南京報到，屈翼鵬先生是較早返京的一批，我因要往河南、湖北探親，走西北公路轉隴海、平漢鐵路，到五月才抵達南京。

澤存書庫係屬敵偽產業，經政府清點房產圖書，連同陳羣在上海、蘇州所藏的善本，全部撥交中央圖書館，置特藏組於此，並附設北城閱覽室，專供閱覽舊籍。抗戰期中所蒐購貯存上海的善本，陸續運回南京。被日本海軍掠奪去的百餘箱善本書，經委託我駐日軍事代表團查訪，終在東京郊區一圖書館中發現，鐸封尚未開啓，原封不動，也船運回國，頤和路澤存書庫，走廊書箱山積，同仁等均忙於開啓書箱整理登錄、改編及鈐蓋收藏印記等工作。我抵達南京報到後，奉令結束史籍考的編纂而參與善本書之整理考編工作。這時澤存書庫的藏書，蒐購的善本連同原藏的善本舊籍，應已超過50萬冊了。

中圖藏的居延漢簡30枚，是慰堂先生拿了一部宋刊元明遞修補十行本(即所謂三朝本)毛詩注疏，與國立蘭州圖書館交換得來的。蘭州圖書館原為省立，抗戰勝利後，慰堂先生鑒於我國疆域遼闊，要推展社會教育，而地方政府財力不足，乃建議多設國立圖書館，因之蘭州、西安、重慶的圖書館皆改制為國立。慰堂先生一直期望館內能設置一間圖書印刷史的展示室，故採購了若干片甲骨文，現又交換到漢簡30枚，有了古代的文書實物，故慰堂先生異常高興，距設置展示室的願望走近了一步。中圖的宋三朝本毛詩有複本，而蘭州圖書館所藏沒有一部宋版，這種交換可謂各取所需。

勝利復員後，中圖採訪組仍編有預算在民間繼續採購善本書。36年，採購了一部元刊朱墨本的金剛經註。這部佛經原藏寺廟，自來未見於著錄，消息披載後，引起書林不小的騷動，過去印刷史研究的學者都認為朱墨套印技術是明萬曆末年(17世紀初)吳興人閔齊伋所首創的，今在他之前兩百六十多年竟已知套印方法，故北方的學者多存懷疑不敢置信，紛紛來南京觀賞，迨見到原書後，確定是元版無疑，但對文獻上何以記載閔氏發明套版，仍不能釋然於懷。那時我在明萬曆初年(16世紀末期)胡應麟所撰的經籍會通中發現了一段資料，胡氏說：「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之」。可以證明在閔氏之前二三十年胡氏即已見到有雙印之書，所謂雙印，即是在一塊書版上分別用不



本館收藏12萬餘冊善本圖書，收藏過程冊冊皆辛苦

同的顏色各印刷一次，印成一張紙上呈現兩種顏色的印品，這不同於閔氏發明的套版印刷，而是套版印刷術的前驅。經仔細檢視金剛經，確是用同一塊版經過朱墨兩色兩次印成的，我寫了一篇短文章發表於中央副刊，總算找到了文獻上的證據，應能使學者們釋疑。這部金剛經是套版印刷發展史上重要的物證。

在南京，中圖陸續蒐購到敦煌寫經153卷，其中有一單葉，在善本書日上訂為「舊刊本佛像」，是把佛像雕成印章即所謂的「佛印」，醮墨鈐蓋在紙上，形成滿紙的佛像；又有一卷唐代寫本「佛說佛名經」卷子，每一位菩薩名稱下方也都加鈐了佛印，並用各種顏料著色，形成了彩描佛像，這是從印章轉型到雕版印刷過渡時期的證物，證明唐馮雲雲仙雜記中記載唐初玄奘法師每年印製普賢菩薩像有五匹馬馱載那麼多來分贈於人，是可以相信的。

中圖善本書中宋版甚多，大都具有學術上的價值，而宋版中當推南宋書棚本江湖羣賢小集60冊為鎮庫之寶，談起這部書購得實為不易。過去流傳的南宋江湖詩集，都是從毛晉汲古閣所謂影宋鈔本輾轉傳錄，明清幾百年間沒有一位藏書家真正見過宋版。抗戰勝利後，此書突然在上海出現求售，但索值過昂，中圖無力收購，後來為黨國元老吳稚暉、張溥泉兩位先生聞悉，歎為國寶，應收歸國有，不能任它流落民間，遭致不虞，乃聯銜致書蔣委員長，奉批交中央圖書館照價購買。當時通貨膨脹，國幣貶值，此書係以黃金議價，付款時按當日黃金牌價折算關金券。此書係以專款購得，送往審計部核銷時，經辦人員簡直不敢相信，此60冊書竟需如此鉅款，他說假如不是有蔣



委員長手諭批准，沒有人敢同意核銷的。陳起父子是南宋中期杭州著名的出版家，他們刻的書自來為藏書家所寶貴，能藏得一二冊已足以傲視同儕，譬如近代南京著名藏書家鄧邦述，他收藏有書棚本李羣玉集及碧雲集兩種，而把他藏書處名作羣碧樓，可視他的珍視此書。這部國寶鎮庫之書，在民國 60 年代的初期，不知用何種方式，或何種條件竟被書商輕易地影印出版了。影印出版以廣流傳，本非壞事，但此書在臺灣並不易見到，中圖也僅只有一部，按規定中圖應收得若干部版權書，以供國際交換，而交換處並無此書交換的紀錄，那些書跑到那裡去了？想起來令人扼腕浩歎！

唐五代的刻本，現今傳世可考的，除了四川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外，大都散在國外，中圖沒有一件，在圖書印刷史的展示不能不說是缺憾。在臺復館之初，慰堂先生探聽到蔣毅孫先生收藏雷峯塔所出五代吳越國王錢俶所刻陀羅尼經卷有兩份，一再與之情商，希望能讓售一卷予中圖，但毅孫先生靳惜不允。一直到 49 年大陸出版了一套中國版刻圖錄，發行量不多，臺灣不易購得，才商得毅孫先生同意，慰堂先生以臺幣貳仟元委託正中書局在港設法購到一部，與之交換始得入藏。錢俶刻此經卷，在時代上已入北宋太祖開寶八年，但此時吳越尚屬獨立王國，未入宋版圖，故書刻的系統仍可歸屬五代。

中圖所集藏的 12 萬冊善本，舉目當世，只有大陸上北京圖書館尚可相頡頏，其他處所收藏皆瞠乎其後。中圖收藏雖富，但也不是沒有缺憾，譬如羣經注疏合刻，只有宋建刊十行本，而無一部注疏合刻最早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於元九路刻本諸史，尚缺史記及兩漢書。慰堂先生曾請人雕鏤了一顆印章，文為：「百宋千元萬明之章」，表達了他對中圖集藏善本的願望。中圖現藏宋版，已超過了兩百部。明版雖尚不到萬種，估計已有六七千部，所差尚不太遠，且明版存世尚有不少，稍加努力，應不難達到。元版目前也只有二三百部，距離千種尚為遙遠，但懸為鶴的，使後繼者有一目標，總是好的。

最後來談一談中圖所藏善本的特色，談藏書特色很難，因為見仁見智，各有偏好。一般而言，我認為的特色有三：

一、清代中葉藏書最富，賞鑒眼力最高，應推吳縣的黃蕘圃丕烈。黃氏是書中的伯樂，最懂得書的精

蘊藏好，他熟於版本目錄，書一經他手，真偽立判，特點輒知。他又勤於筆墨，往往將所知題記於書的前後護葉，自一跋以至於十餘跋，多屬書林的掌故。他的朋友王芑孫為他撰陶陶室記一文，說：「其於校本之先後，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黃氏的題跋，自嘉道以來甚受到藏書家的重視，「黃跋本」成為一專有名詞。清光緒以來輯其題跋編刊者不絕於縷，估計經他題跋的書，幾近千種，凡黃跋的書，其值皆高出他本甚多。民國初年、蒐集黃跋的書最力的是吳興張氏適園的後人張述伯，抗戰期中，張述伯的藏書全部售歸中圖。中圖所藏黃跋的書，我雖未作統計，估計應在二百種左右。黃跋的書雖近千種，但有的已不在人世，中圖所藏應屬最多的單位。過去我曾輯出若干種為蕘圃藏書題識及續錄所未收者，恐怕仍有遺存，希望有人續補。

二、中圖所藏善本第二個特色是明代史料宏富。滿清入關後，為著箝制漢人的民族思想，康熙以來屢興文字獄，乾隆又扛著稽古右文的大招牌，假纂修四庫全書為名，而澈底清查存世的圖書，消滅不利清人的言論，並達到掩飾清兵入關的史實。他公布了違礙焚禁圖書的書目，禁止民間私藏。但禁歸禁，仍有不少人密藏，這些書絕大多數是明版。民國以來，收藏明版最力的是吳興劉承幹氏的嘉業堂，他曾出版了一部所藏明版書目。又陳羣的澤存書庫所藏的明版亦甚多，兩家收藏都歸入中圖，故中圖所藏最富，很多都是僅存的孤本，再加上若干的抄本，故有關明代的史料，中圖可以說為各館收藏的翹楚，為他家所不及。

三、第三個特色是明代版畫書收藏最多。明代自嘉靖以後，出版商為了爭奇鬥勝，所雕鏤的書多附插圖，請名家繪畫，使得書籍藝術化，成為一代的出版特色。中圖所藏的明版既多，當然版畫書也多。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鄭振鐸在抗戰前即非常喜愛版畫，蒐藏豐富，而編輯中國版畫史圖輯，出版了若干集，抗戰期中，他把他的收藏全部售歸中圖，而且還協助中圖在上海收購善本，繼續精選有關版畫的書，購得後即選擇攝照留存，以供編印圖輯之用，因之中圖所藏的版畫書既多且精了。

• 昌彼得先生，曾任本館特藏組主任，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故 舊 篇〉

祝館慶憶往事

程 光 裕

國立中央圖書館建館迄今，屆滿六十年，周甲大慶，無任歡欣。猶憶民國 43 年(1954)6 月 1 日張其昀(曉峯)先生接任教育部長，同年 6 月 7 日我隨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劉先雲先生到廳任主任秘書。張部長於教育興革大力推動，一日召我去部垂詢省立臺北圖書館及各校圖書館情形，並說：「一個國家總要有個體面，總不能讓外國人來了看不到一個具有規模的國家圖書館、國家歷史文物館。」又說：「總統蔣公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於音樂、美術、電影，諄諄訓示，要設立音樂院、美術館、歌劇院及國家經營電化教育事業，培養國民康樂的心情，增進國民心理康樂的目的。設立圖書館、科學館、古物陳列館來配合教育。」又有一次與我談到杭州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文瀾閣的情形，在風光秀麗的西子湖閱讀的樂趣。認為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的環境必須幽雅有情趣，對省立臺北圖書館、博物館的建築與造型及新公園的林木扶疏至為欣賞。

44 年(1955)元月某日，張部長偕劉廳長至南海路植物園巡視，並商談博物館、圖書館、科學館、美術館及歷史文物館問題，劉廳長建議以建功神社原址為中央圖書館復館館址，商品陳列館為歷史文物館館址，獲得採納。

日據時代的建功神社，臺省光復時，由臺灣民眾教育館接收，民教館停辦移交給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為省教育廳附屬機構，國語會內設有國語日報館，將神社祭堂的兩廡作為機器間與排字房，此兩廡係日人將舊臺灣巡撫衙門拆遷改建，其頭門、二門及大堂則拆遷至植物園內，光復後作為林業試驗所的職員宿舍，後經整修為林業陳列館。

舊建功神社，自國語會駐入，發現白蟻、蛀蟲嚴重，驅蟲難盡，教育部既決定中央圖書館在此復館，教育廳遂配合與國語會協調遷會讓址，時何容先生任國語會主任委員，頗有難色，適中央政策令臺省政府

機構疏散，教育廳撥款予國語會在木柵修建房舍。數月後，房舍未成，教育部以中央圖書館復館期迫，促教廳設法先遷出國語會，教廳將國語會暫時移至廳內，中央圖書館乃得於 44 年 9 月遷入國語會舊址正式辦公，時儲連甲先生任館方總務主任，修繕原神社祭堂及兩廡房舍，及添造房屋等工作備極辛勞，後竟以積勞亡故，殊為惋惜！

中央圖書館復館，館長蔣復璁(慰堂)先生，他居於館後右側牆垣邊一小屋，生活簡樸，治事嚴明，一日我訪，見有工人挑土傾入館前荷塘，詢知乃館方為擴展館地修建前廊，因即面知慰老，並以張部長重視館舍環境，荷塘清趣，景觀佳勝，宜予保留，館地擴展宜另作他圖。慰老吩咐停工。數年後張部長至南海學園，於荷塘邊注視良久，神情愉悅，慰老聞之，對我之進言至為感佩！

慰老為圖書目錄學家，我戲稱為「中國圖書館王」，他兼治宋史，姚從吾、方豪(杰人)、趙鐵寒諸先生俱為宋史專家，我曾師事陳樂素先生治宋史，慰老與從吾先生對樂素師極為欽仰，一日我與諸先生談敘，言及抗戰時從吾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樂素師在遵義浙大講授宋史，啓導青年，影響殊大。杰人先生乃建議諸人定期聚談，由我任聯絡，曲顯功先生任文書。於是成立宋史討論會，假中央圖書館擇期舉行，館方供應場地茶水，此會後改名宋史座談會延續迄今，由於中央圖書館遷徙至中山南路新館舍，乃易地擇期召開。今則從吾、鐵寒、慰老、杰人諸先生先後歸道山，不勝懷念！

46 年(1957)8 月省府改組，教育廳長易人，我轉任臺灣師範大學教職，教育部已建立植物園為文化中心，名南海學園，內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先生)、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包遵彭先生)、國立臺灣藝術館(館長盧孰競女士)、國立臺灣科學館(館長羅榮安先生)、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由教育部社教司